

一、近期中共重要黨政領導人事異動簡析

中共研究雜誌社特約研究員吳仁傑主稿

- 截至 6 月下旬，有 8 名中央和地方黨政領導更替，除為補足原有空缺、因防疫不力提前去職或卸任外，主要導因原任者屆退。
- 中中共中辦副主任孟祥鋒將依慣例接替丁薛祥升任主任、中紀委副書記楊曉超出任國監委主任及唐登杰調發改委黨組副書記，預示何立峰可望接替劉鶴現職，並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 31 名省級黨委書記，由省（市）長調升者達 19 名，凸顯其升遷的絕對優勢。此外，中央部委和地方分別有 8 名、7 名首長，已超過或年內將滿 65 歲屆退，勢必再引發連串異動。

（一）前言

中共預於 2022 年秋天舉行第 20 屆全國代表大會（即 20 大），有關籌備工作按照慣例將自 2021 年中逐步展開，而組織方面部署會率先啟動（主要是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等「兩委」選拔工作先拉開序幕）。是以自被視為屆中的 2020 年起，伴隨較多正省部級黨政領導屆滿 65 歲任職上限退下（卸任一線黨政要職，轉任人大、政協等二線職務），開始較密集進行中央和地方黨政重要領導更替。

由於正省部級中央和地方黨政領導多在全國黨代表大會換屆時被規劃為中央委員，且省級黨委書記是調升中央政治局委員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優勢職位，歸納相關異動履新要況，除有助瞭解和掌握中共幹部任用趨向，亦可藉以觀察下屆中央領導成員可能人選。本文綜整 2021 年以來中央和地方正省部級黨政領導調整概況，分析其意涵及可能發展，藉供參考。

（二）2020 年調整要況

中共在 2020 年間進行 19 大以來最大規模中央和地方正省部級領導調整，主要導因於原任者屆退，履新者要況如下：

1. 中央系統方面

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常務副書記孟祥鋒調任中央辦公廳常務副

主任，遺缺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梁言順接替；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兼第1副院長潘岳，調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兼國務院僑辦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務副主任江金權升任該室主任；中紀委副書記李書磊出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人民日報社總編輯庹震兼任該社社長。

福建省長唐登杰平調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副書記兼副主任；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局長蕭亞慶調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長，遺缺由全國總工會黨組副書記兼副主席張工調升；中紀委副書記陳小江出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遼寧省長唐一軍、甘肅省長唐仁健、黑龍江省長王文濤、陝西省委書記胡和平、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副書記兼紀檢監察工委書記侯凱，分別調任司法部長、農業農村部長、商務部長、文化和旅遊部長、審計署審計長；生態環境部副部長黃潤秋、新疆區委副書記兼生產建設兵團政委孫金龍，分別調升該部部長、黨組書記兼副部長；商務部黨組副書記兼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俞建華，升任該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轉任該辦黨組副書記兼副主任，遺缺由全國副主席夏寶龍兼任；新華通訊社總編輯何平兼任該社社長；中科院黨組副書記兼副院長侯建國升任該院院長，遺缺由天津市委副書記陰和俊調升。

2. 省級系統方面

四川省長尹力調升福建省委書記，空缺由河南省委常委兼常務副省長黃強升任；浙江省長袁家軍升任省委書記，遺缺由省委副書記鄭柵潔繼任；湖南省長許達哲出任省委書記，空缺由國家電網有限公司董事長毛偉明接替；上海市長應勇調任湖北省委書記，空缺由山東省長龔正平調，另生態環境部長李干杰接替龔員遺缺；天津市長張國清調升遼寧省委書記，空缺由上海市委副書記廖國勛調任；吉林省長景俊海升任省委書記，遺缺由農業農村部黨組副書記兼副部長韓俊調升。

陝西省長劉國中升任省委書記，空缺由河北省委副書記趙一德接替；貴州省長諶貽琴升任省委書記，遺缺由江西省委副書記李炳軍繼任；雲南省長阮成發出任省委書記，省委副書記王予波升任省長；海南省長沈曉明接任省委書記，遺缺由浙江省委常委兼常務副省長馮飛調升。另福建省委副書記王寧升任省長，江蘇省委副書記任振鶴調任

甘肅省長，廣西區政協主席藍天立出任區政府主席；青海省長劉寧平調遼寧省長，遺缺由安徽省委副書記信長星出任。

（三）2021 年更替概況

2021 年以來，截至 6 月下旬中央系統有 8 名正省部級領導調整，包括中共中央和社會團體各 2 名、國務院 4 名，其中原任調職 3 名、屆退 3 名、病逝和提前離任各 1 名；省級黨政主要領導亦有 8 名更替，包含省級黨委書記 3 名（河南、山西、甘肅）、省級政府主要負責人 5 名（湖北、安徽、河南、黑龍江、山西），其中調職 5 名、屆退 2 名、提前離任 1 名。有關要況分述如下：

1. 中央系統方面

中紀委副書記李書磊、陳小江分別調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之遺缺，由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黨組副書記兼理事會主任喻紅秋（女，1960 年生，61 歲）、湖南省委常委兼紀委書記傅奎（1962 年生，59 歲）接替；水利部長鄂竟平、國務院參事室主任王仲偉、全國總工會書記處第一書記兼副主席李玉賦屆退，空缺分由安徽省長李國英（1963 年生，58 歲）、國務院副秘書長高雨（現齡不詳）、河北省委副書記陳剛（1965 年生，56 歲）調任；應急管理部黨委副書記兼部長王玉普病逝，該部黨委書記黃明（1957 年生，64 歲）兼任部長；現齡 63 歲的社科院黨組副書記兼副院長王京清提前卸任，空缺由該院副院長高翔（1963 年生，58 歲）升任；喻紅秋調職後，空缺尚未補實。

2. 省級系統方面

黨委書記部分，河南省委書記王國生屆退，遺缺由山西省委書記樓陽生（1959 年生，62 歲）平調，山西省長林武（1962 年生，59 歲）升任省委書記；甘肅省委書記林鐸屆退，遺缺由河南省長尹弘（1963 年生，58 歲）調升。

省（市）長或區政府主席部分，現年 61 歲湖北省長王曉東提前離任，遺缺由省委常委兼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1962 年生，59 歲）升任；安徽省長李國英、河南省長尹弘、山西省長林武調職、黑龍江省長王文濤此前調任商務部長，空缺分由山東省委常委兼青島市委書記王清憲（1963 年生，58 歲）、吉林省委常委兼長春市委書記王凱（1962 年生，59 歲）、山西省委副書記藍佛安（1962 年生，59 歲）、福建省委副書記胡昌升（1963 年生，58 歲）升任。

（四）結語

2021 年以來中共中央和地方正省部級領導調整，除為補足原有空缺、因防疫不力提前去職（如湖北省長王曉東）或提前卸任（如社科院黨組副書記兼副院長王京清）外，主要導因原任者屆退（退出一線黨政職務，轉任全國人大或全國政協專委會副職領導），包括水利部長鄂竟平、國務院參事室主任王仲偉、全國總工會書記處第一書記兼副主席李玉賦及甘肅、河南省委書記林鐸、王國生等 5 名。

其次，觀察近兩年中央級相關領導更替，已見為下屆中央高層領導布局跡象，其中孟祥鋒平調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將依慣例在 2022 年秋天 20 大前接替丁薛祥升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並出任下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紀委副書記李書磊調任智庫系統的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使中紀委副書記兼秘書長楊曉超接替楊曉渡出任國家監委主任及進入中央政治局機會大增；福建省長唐登杰平調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副書記兼副主任，顯為接班預作準備，預示作為習近平重要隨員的該委主任何立峰屆時可望接替劉鶴現職，並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復次，2020 年以來計有包括遼寧唐一軍、福建唐登杰、安徽李國英、黑龍江王文濤、甘肅唐仁健等 5 名省長，調任國務院部委領導，有關調整相對於調升省級黨委書記雖屬平調，但由主管省級政府全般工作的省長出任國務院部委首長，既強化任職歷練，且有助在決策時更符合地方實需。

再次，2021 年以來省級黨委書記共有 3 名履新，包括 1 名平調、2 名由省（市）長調升。綜觀現今 31 名省級黨委書記，扣除平調 10 名計 21 名，由省（市）長調升者達 19 名、佔比 90.48%，凸顯其升遷的絕對優勢；年齡分布雖略呈梯隊結構，然「55 後」21 名、「60 後」前期僅 10 名，新老交替程度有待強化。其中 2020 年上任、1964 年出生現年 57 歲的遼寧省委書記張國清，為當前最年輕的省級黨委書記，但仍未出現「65 後」。另隨抗疫有功的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升任湖北省長，隱喻 2020 年初臨危接掌湖北「救火」的應勇，進入下屆中央政治局應無疑義；而身為少數民族且是唯一女性省級黨委書記的貴州省委書記譚貽琴，接替即將屆退的孫春蘭成為中央政治局中女

性代表機會亦大。

再者，2021 年迄今共有 5 名省級政府主要負責人新任，包括由省級黨委副書記調升 2 名、省級黨委常委升任 3 名（全數兼任大城市市委書記）。觀察當前 31 個省市區政府主要負責人，扣除上海、遼寧 2 名平調計 29 名，其中以由省級黨委副書記升任 16 名、佔比 55.17% 最多，顯係調升最有利職位；由省級黨委常委升任 8 名（兼任大城市市委書記 4 名、兼任常務副省長 3 名、兼任省級黨委統戰部長 1 名）、佔比 27.59% 次之。另「60 後」25 名、「50 後」6 名（「55 後」5 名），以 1965 年出生的陝西省長趙一德年紀最輕，也是省級黨政主要負責人中唯一「65 後」，後續仕途發展頗值持續關注。

此外，近兩年中央和地方正省部級領導雖已進行數波密集調整，但因中央部委有 8 名正省部級領導、地方有 7 名省級黨政主要負責人，已超過或年內將屆滿 65 歲任職年齡上限，其中多數料將在年中到年底前屆退，勢必再次引發連串異動，除進一步帶動相關領導年輕化，新任者也將是下屆中央委員會規劃成員。

二、中國大陸2021年就業情勢展望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員王國臣主稿

- 2021年中國大陸就業情勢好轉肇因於低基期幻覺，惟隨時間推移，失業問題再度浮上檯面，尤其一線大型城市與青年失業率。
- 制約就業因素包括：美中貿易戰與產業鏈發酵，及債務壓力沉重，國際原物料價格飆漲及內需不振，中資企業只能縮減產能，加劇失業問題。
- 中國大陸政府提倡靈活就業，惟面對輸入型通膨顯得進退兩難；民眾悲觀看待就業前景，社會瀰漫「躺平主義」的消極氛圍。

（一）當前中國大陸就業情勢

隨中國大陸逐漸走出肺炎疫情的陰霾，就業情勢亦明顯改善。2021年前5個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574萬人，較去年同期成長（年增）24.8%，且達成全年目標值（1,100萬人）的52.2%。特別是，3月底17,405萬農民工外出務工，年成長率更高達42.1%。同期，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估算，職缺與求職者的比值為1.66倍，較上季回落14.9%，顯示謀職趨於容易（見圖1）。

相對而言，截至2021年3月底，中國大陸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9%，較上季回落0.3%。5月底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亦連續第三個月下滑。惟大型城市調查失業率，高於全國0.2%，顯示一線城市的失業問題相對嚴峻。此外，16-24歲青年失業率由2020年12月底的12.3%，攀升到2021年5月底的13.8%。換言之，就業情勢尚未完全穩固（見圖2）。

（二）影響中國大陸就業的關鍵因素

中國大陸就業好轉或只是低基期產生的幻覺。例如：2021年4月底，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用工人數年增1.0%，增速較上月削減0.7%，且連續第三個月趨緩。究其原因，產業鏈脫鉤持續壓抑就業市場。最佳例證是，港澳臺與外資企業平均用工人數，較去年同期衰退1.8%。國有企業平均用工人數也衰退2.4%，表明國企基於績效而不

願增加人事成本。

此外，中國大陸企業經營依舊困難。如圖 3 所示，2021 年前 5 個月，共 9 家中資企業引爆 44 起債務違約，涉案金額達 511 億人民幣，其中不乏若干大型企業，舉凡海南航空、華夏幸福，以及紫光通信。同期，中資離岸債違約 37 億美元，全年違約金額或突破 2020 年甫創下的歷史記錄（83 億美元）。易言之，企業自顧不暇，實無力擴充規模。

通貨膨脹與緊縮並存，更增添失業問題的複雜性。2021 年 5 月，中國大陸生產物價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 PPI）年增 9.0%，創 2008 年 10 月以來新高；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核心 PPI）更暴增 12.5%，顯示輸入型通膨壓力漸增。惟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僅成長 1.3%，扣除食品與能源價格後的核心 CPI 更只剩 0.9%；故廠商可能自行吸收原物料上漲成本，加劇經營困難（見圖 4）。

鑑於原物料價格飆漲，中資部分製造商已拒接訂單，甚至考慮暫停營運。如圖 5 所示，2021 年 5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與非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nonmanufacturing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NMI）中的新出口訂單指數，分別落在 48.3% 與 47.6%，皆呈現連續兩個月下降的趨勢，且雙雙跌破 50% 的景氣榮枯線，顯示廠商傾向縮減產能，將加劇原已沉重的失業壓力。

（三）中國大陸就業政策

中國大陸政府已意識到失業問題的嚴重性。例如：2021 年 6 月 16 日，國家統計局坦言，就業形勢雖有所改善，但壓力依舊沉重；特別是 909 萬大專院校應屆畢業生的謀職。甚者，國家統計局尚揭露，今年城鎮新增勞動力為 1,400 萬人，年初設定的目標值僅為 1,100 萬人，顯示北京當局早已規劃 300 萬人失業；這相當於登記失業人數的三分之一。

對此，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 2021 年 5 月 12 日緊急提出，促進平臺經濟企業拉動靈活就業，含括個人經營、非全日制，以及與數位經濟相關的新就業形態。5 月 20 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再發布《關於延續實施部分減負穩崗擴就業政策措施的通知》，延長補貼生活費

用、職業訓練與實習，並擴大失業保險請領範圍至 12 月 31 日。

不僅如此，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6 月 3 日又重申「強化就業優先政策」，重點包括：一是減稅降費，含括延長增值稅優惠期限，且將起徵點提高 5 萬人民幣。小型微利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則減半徵收所得稅。二是優化營商環境，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再縮減，尤其針對服務業領域。最後是完善社會援助機制，保障基本民生。

(四) 中國大陸就業市場前景

中國大陸民眾最能體會就業市場的緊縮。《城鎮儲戶問卷追蹤調查》的統計顯示，2021 年第 1 季，14.8% 的受訪者預期「形勢較佳且就業容易」，較上季回升 1.5%，惟低於美中貿易戰爆發前的水準（2018 年第 1 季為 17.1%）。反之，認為「形勢嚴峻且就業困難」的比例仍高達 34.4%。尤其是，這還未考量基期效應遞減、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的影響（見圖 6）。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消費者信心指數（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 CCI），則約略反應就業市場的萎縮。2021 年 4 月，CCI 中的就業滿意與預期指數，分別為 123.5 點與 130.3 點，皆呈現連續兩個月的下滑態勢。此外，PMI 中從業人員指數，亦連續兩個月滑落；僅 NMI 中的從業人員指數微升 0.2 個百分點，但兩者仍處於景氣衰退狀態，顯示就業復甦步履蹣跚（見圖 7）。

附帶一提的是，2021 年 4 月，百度刊登一則貼文《躺平即是正義》，主張「站不起來，又不願跪著，那就索性躺平」，迅速引起中國大陸網友共鳴。這反應年輕人對現實生活的挫敗，只願意選擇做最低限度的工作，並與習近平提倡的「撻起袖子加油幹」，形成強烈反差。綜言之，「躺平主義」佐證民眾悲觀看待就業前景。

(五) 結語

即使中國大陸經濟率先全球復甦，惟就業情勢仍非常嚴峻。這尤其表現在港澳臺與外資企業，持續縮減員工規模，顯示美中貿易戰與產業鏈韌性（resilience）持續發酵。此外，中國大陸經營環境愈趨艱困，也壓抑就業市場的擴增。諸如：債務壓力沉重、國際大宗原物料價格

飆漲，以及內需動能萎縮；故國有企業都無力配合政策，更遑論其餘企業。

據此，中國大陸政府於 2021 年 5 月密集推出多項促進就業政策，舉凡靈活就業、延長就業補助，以及強化就業優先。惟民眾仍看淡就業市場前景。例如：PMI 從業人員指數與 CCI 就業滿意與預期指數，皆連續兩個月的下挫。即便 NMI 中的從業人員指數微幅反彈，但長達 33 個月都處於景氣衰退；上述數據都指向失業問題非常嚴重。

後續值得關注的是，輸入型通膨、人民幣匯率與就業間的連動關係。2021 年 5 月 21 日，中國人民銀行研究部提議，以升值對沖國際物價上揚。影響所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 24 日 6.4408 暴衝到 6 月 1 日的 6.3572，迫使外匯存款準備率緊急上調 2%。換言之，匯率升值雖有助於壓低進口價格，卻也削減出口競爭力；兩者皆不利企業存續。此亦凸顯北京當局的政策困境。

圖 1 中國大陸城鎮就業情勢（2018 年 6 月至 2021 年 5 月）

A. 城鎮新增就業人口

B. 城鎮勞動力市場供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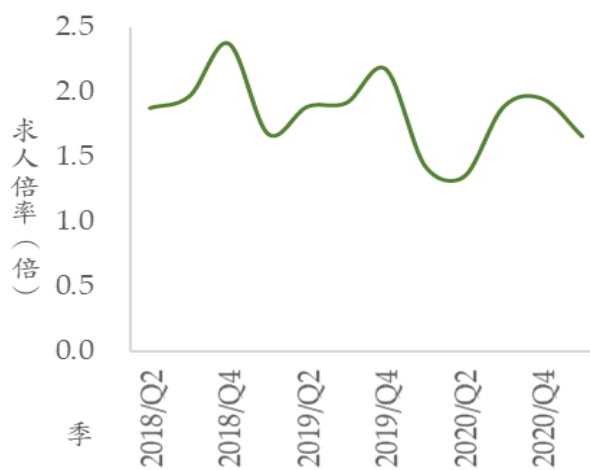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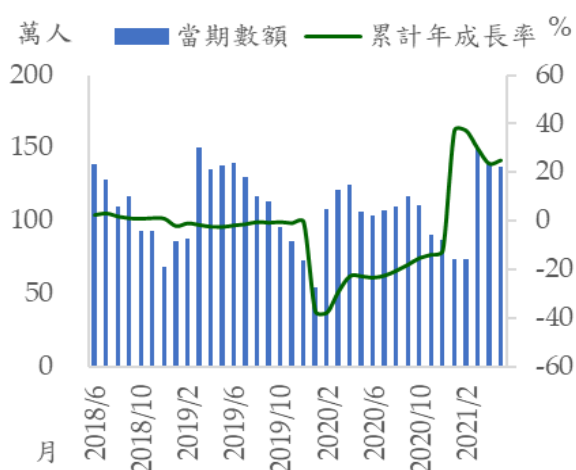


圖 2 中國大陸城鎮失業率（2018 年 6 月至 2021 年 5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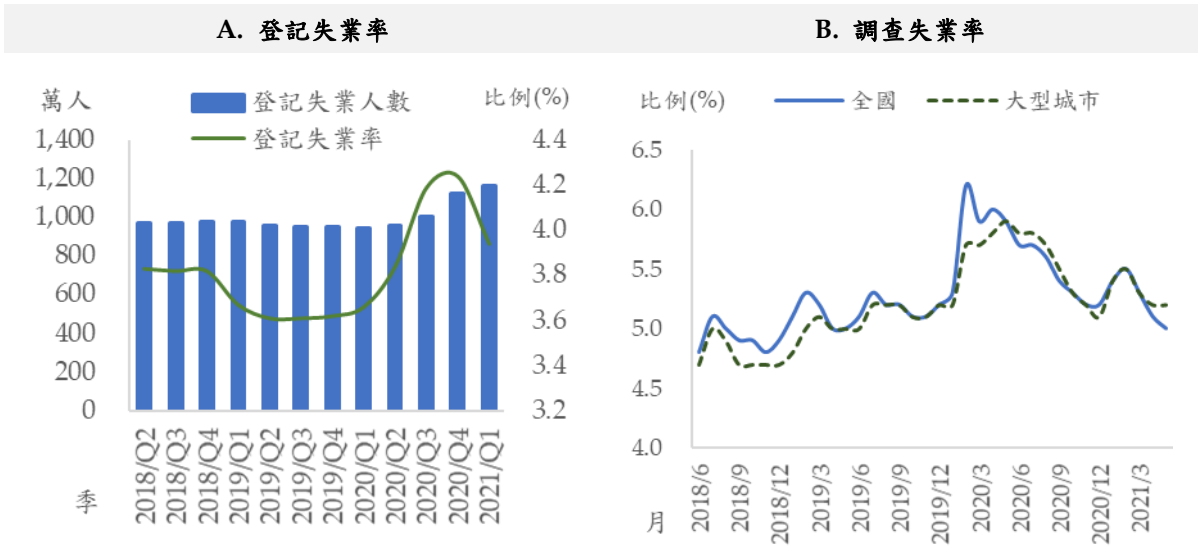


圖 3 中國大陸企業債務違約（2018 年 6 月至 2021 年 5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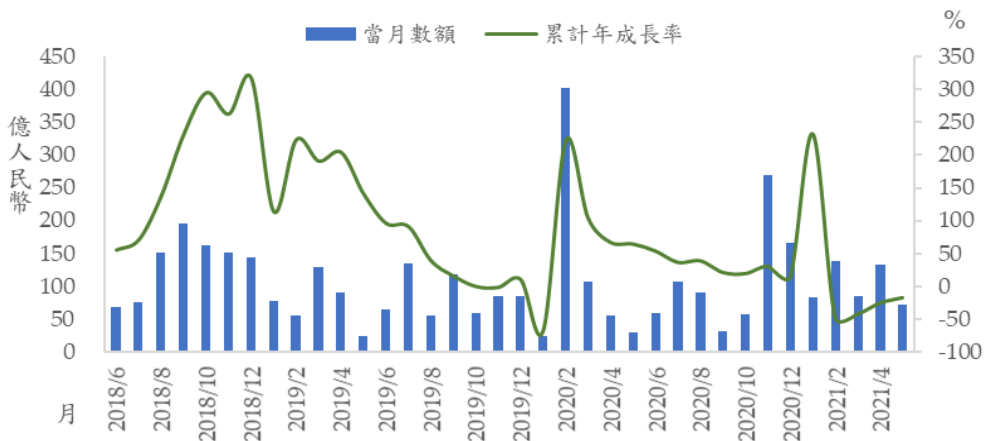


圖 4 中國大陸物價水準（2018 年 6 月至 2021 年 5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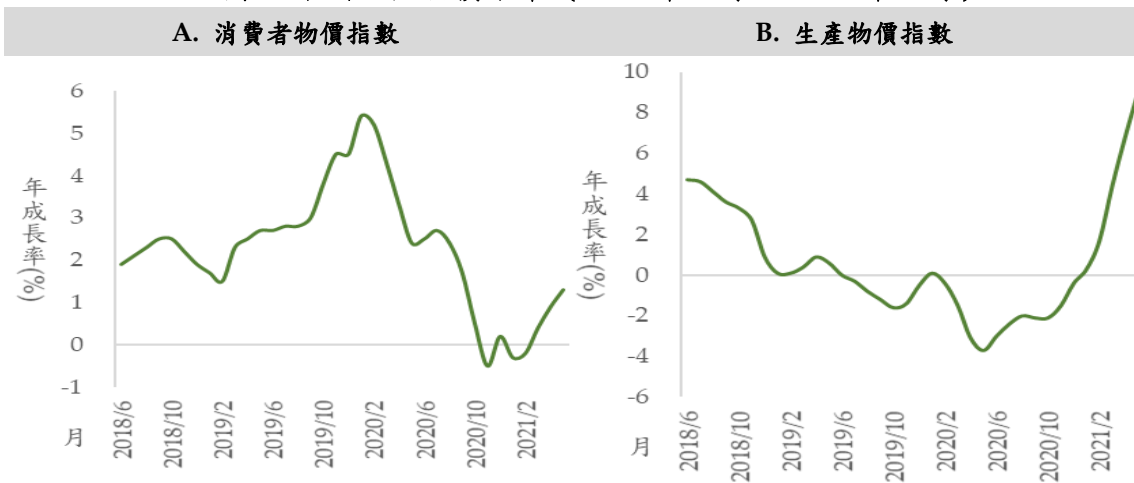


圖 5 中國大陸新出口訂單指數 (2018 年 6 月至 2021 年 5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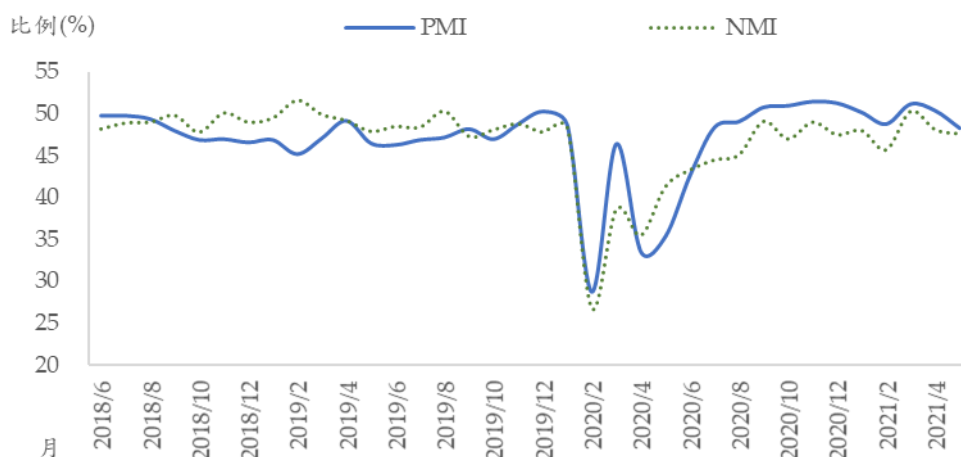


圖 6 中國大陸城鎮儲戶就業預期調查 (2018 年第 2 季至 2021 年第 1 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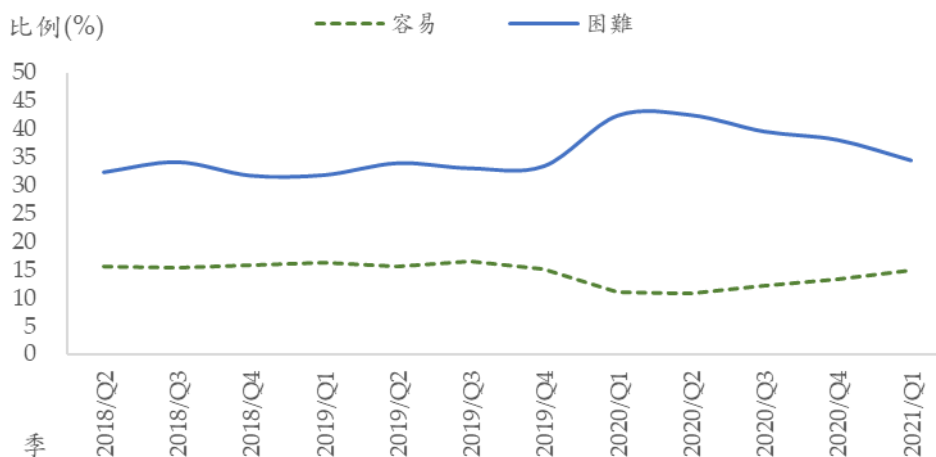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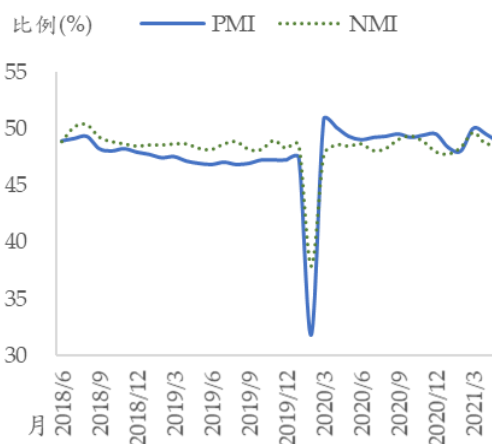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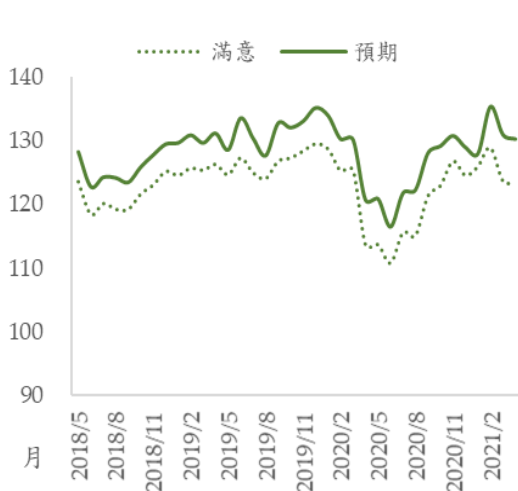


圖 7 中國大陸就業市場景氣 (2018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

A. 消費者信心指數

B. 採購經理指數



三、2021年英國G7峰會系列活動觀察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登及主稿

- 拜登總統上任後，在美國疫情趨向緩和之下，接連進行多場雙邊與多邊峰會，落實選舉時「美國回來了」的政見。
- G7+4 逐漸成形，有醞釀「大西洋-印太一盤棋」應對北京的趨勢。
- 新的「印太主義」與傳統「歐洲中心主義」仍在西方陣營中拉鋸。歐洲國家以漸進方式轉向印太，但對直接與中共交鋒，意願仍比太平洋國家為低。

(一) 背景：拜登奮力重回全球領導，G7 起死回生

2021 年 G7 英國康沃爾高峰會好事多磨，原因不僅是本次會議仍在新冠疫情 (Covid-19) 籠罩之下召開，且是由新任的美國總統拜登 (Joe Biden) 取代大幅偏離二戰以來美國以多邊主義 (multilateralism) 領導國際秩序的川普 (Donald Trump) 後，首度出訪並出席的西方集團高峰會，因而象徵性意義極高。

回顧 G7 峰會近年軌跡可謂一波三折。疫情之前 2019 年 8 月在法國度假勝地亞里茨 (Biarritz) 召開的 G7 峰會，就因川普意興闌珊，竟然連公報都沒有發出。當年的峰會還發生歐洲各國對美國巨型網路企業開徵數位稅 (digital tax) 引發川普揚言報復法國紅酒的爭議 (新新聞, 2019 年 8 月 24 日)。當年川普勉強出席諾曼第登陸戰 65 週年活動，行程匆忙到只安排包含訪問英、法與愛爾蘭三國共計 3 天 (TVBS 新聞網, 2019 年 6 月 6 日)。

再往前一年，G7 高峰會由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Justin Trudeau) 主持，川杜兩人向來不合，加上梅克爾 (Angela Merkel) 與馬克宏 (Emmanuel Macron) 堅持「法治為基礎的貿易體系」引起川普不滿，川普竟然以推文提前宣稱會議公報破局 (中央社, 2018 年 6 月 10 日)。2020 年原本輪到美國為 G7 東道主，川普還打算在馬里蘭州大衛營 (Camp David) 盛大主持，卻因為美國疫情竟然「意外」爆發大失顏面，索性取消 (May 31, 2020, Guardian)。從 2018 年以來，由於美國與歐洲盟國嚴重疏離，甚至逼使自認與川普還算友好的前日本首相安倍也被迫與他保持距離，採取美

中之間的避險路線 (Feb 21, 2020, The Interpreter)。所幸拜登如民調預期以大比數擊敗川普，西方陣營大大鬆了一口氣，而拜登總統也風塵僕僕，接連進行美日峰會、美韓峰會、美英峰會、G7 峰會、美歐峰會和北約峰會，向世人證明他選舉時的政見：「美國回來了」所言不虛。不僅如此，這次 G7 峰會在英國首相強生 (Boris Johnson) 仍陷在脫歐餘波與二次疫情困擾下，有志在必得的目標，遂提早進行幕僚作業，會議公報順利產生，共計約 70 條 (June 13, 2021, White House Briefing Room)。這可說是原本已經被世人「看衰」的 G7，起死回生的重大轉折。

(二) G7+4 模式與會前會的妥善準備

本次峰會完成 2018 年以來難以完成的會議公報例行大事，還要歸功於 G7 各國事前認真把握、積極準備。其實美國本來就是 G7 的中樞，川普卻向來對多邊機制十分排斥，曾經直言 G7、北約、歐盟甚至聯合國都是損害美國立意的古董。他的外交團隊經過無數次的洗牌，最後是由出身情治單位的強硬派領軍，擅長法律與工衛的專家都被邊緣化，對歐洲尤其關心的氣候、疫情、人權，都興趣缺缺，除了少數極右派團體與媒體，連歷來較為中立的華盛頓郵報，與對外關係協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領導人都期期以為不可 (Foreign Affairs, Vol.98-1, 2019)。幾乎是只有因招致北京以「戰狼」反擊而強化的朝野抗中共識外，美國與盟國、美國社會本身等，都陷入嚴重的分歧。川普去職，美歐自然要即刻修補，顯現戰後多邊主義團結本色。而疫情緩和也十分關鍵。美國從川普下臺前夕的每日確診逾 25 萬人的世界記錄，到 5 月中已穩定降到日確診 4 萬以下。G7 東道主英國也從 1 月的日確診 7 萬人，控制到 5 月中的 3 千人左右。6 月 11 至 13 日於英格蘭西南部康瓦爾郡 (Cornwall) 舉行的正式峰會可望實現，拜登也完成拜訪歐盟與北約總部，甚至安排與俄國的普京總統 (Vladimir Putin) 在日內瓦見面。

G7 過去曾被稱為「世界經濟安理會」，是一個國際組織臺面上有相當威望的機構。為了公報等成果能妥善準備，5 月 5 日舉行的 G7 部長會除了外長還包括七國的發展部長，並且也邀請澳洲、印度、南韓、南非外長以「G7 客人」(G7 Guests) 列席，構成一個 7+4 的模式。

其中澳洲、印度兩國是「印太」支柱，美英操作顯有「大西洋-印太一盤棋」的味道；川普不打算解決的挑戰像是俄國、中東、氣候變化等，各國也開始重新尋求交集。新的難題像是中國崛起，非西方改革國際機制的高漲呼聲，併同疫情肆虐下疫苗分配不公的問題，G7 都不能旁落給自己不能控制的 G20 甚至聯合國來處理。顯然疫後經濟、氣候變遷與可持續發展也是重頭戲。5 月的外長會公報的議題已經暴露了正式峰會的風向球，議題依序區分為俄羅斯、烏克蘭、中國、白俄羅斯、印度太平洋地區 (The Indo-Pacific)、北韓、東海與南海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等項目。拜登就職以來多次說中國是美國本世紀最重要的競爭者，外長會公報把「俄羅斯」放在首章，中國排在第六章，顯然在俄國威脅東歐的形勢下，「歐洲中心主義」與「印太主義」仍有很大的協調空間 (EU External Service, May 5, 2021)。

(三)「中國因素」陰影下的新共識：臺海和平穩定

美國與日本 (加上列席的澳洲) 身處印太區域，對中國挑戰至為關切。拜登此行的一個重點，也是希望傳統盟邦認同美國的大戰略，以中國為新世紀最重要的競爭對手。所以 G7 外長公報不忘重申，維護「自由、公正、開放的市場貿易與資本、資訊的流動」的西方自由民主體制才是世界包容、可持續發展的最佳模式。為了避免東協疑慮，G7 沒有邀請東協任何一國參加 G7+4，卻也重申印太需要「東協中心主義」。

外長公報與峰會公報都幾乎把世界各地的各種議題重申立場，特別是臺海和平穩定及支持臺灣有意義參與世衛各項論壇 (WHO forums, 並非直接參加 WHO) 也首次分別出現在外長公報/峰會公報中。G7 「深切憂慮」(seriously concerned) 臺海，但支持臺灣參與世衛的文字放在外長公報「中國」段落中，臺海問題則放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中，透露著西方集團對於與北京針鋒相對的程度還在斟酌。

(四) 結論：反省全球化缺失，G7 需再出發

此次西方元首們有鑑於川普 4 年治下經歷的反全球化與民粹主義在各地造成的紛擾，已非 G7 這個長期奉行自由化政策與「華盛頓

共識」的集團所能妥理，過去鼓勵的自由競爭與去管制化政策，在世界各國內部已經因不平等造成社會深度分裂。G7 原本的理念也無法為最近 20 年陸續爆發的全球性危機如金融海嘯、氣候暖化與疫情，提供對策。如要走出川普主義的陰影，擺脫各國民粹派抗拒多邊合作的糾纏，勢必要為西方繼續領導世界，提出具有新的時代精神的觀念。

此次 G7 開始醞釀中的「康沃爾共識」(Cornwall Consensus) 於是改而提倡「包容」(inclusion, 取代優勝劣敗)、「韌性」(resilience, 取代效率至上)、「公私伙伴」(partnership, 取代政企分離) 與「外部性」(externalities, 取代對定量模型的偏執)(June, 10, 2021, Financial Times)。這些對 G7 傳統國際秩序理念與共識的改進，都帶著對抗「中國因素」的誘因。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中國競爭造成的壓力，G7 也不會及早展開對全球化缺失的補救。

四、中共近期軍事演訓觀察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馬振坤主稿

- 共軍上半年訓練多以部隊駐地防區為施訓場域，屬年度計畫正常戰訓；近來著重聯合作戰型態，海軍頻繁在黃海、東海、南海及菲律賓海遠訓，凸顯共軍海上作戰力量進步。
- 美軍運輸機載運美參議員訪臺之際，共軍發布東部戰區第 72、73 集團軍作戰演訓訊息，為典型「劃犬為虎」，操作對臺認知作戰。
- 共軍企藉海空聯合作戰及岸基遠程打擊火力奪控巴士海峽和宮古海峽，並將兵力投射至西太平洋，展現對美軍反介入作戰之能力，以掌控臺海情勢。

（一）前言

近期共軍演訓活動不斷，除內陸外，中國大陸周邊北起黃海、南至南海海域，共軍海軍皆有編隊含海軍航空兵進行海空聯合戰訓；空軍不同機種組織編隊進行多機種實戰化訓練；陸軍跟臺海相關者則有東部戰區第 72、73 集團軍進行之兩棲裝載航渡訓練等。

（二）共軍演訓活動具三層面意涵

1. 部隊本身：正常戰訓任務

每年五、六月春夏交替之際，原本即是共軍各部隊依托駐地實施戰訓活動的季節。此類訓練活動皆屬共軍依年度計畫實施之正常訓練，在上半年度部隊訓練任務多屬軍級以下單位組織實施，以依托部隊駐地防區作為施訓場域，除特殊情況，較少有跨區遠程機動之作戰演訓，這類跨區遠程機動訓練多在下半年度舉行，陸軍部隊的機動距離基本上皆屬跨戰區超過一千公里以上。

各部隊在依托駐地實施的戰訓任務內容上，多是與該部隊被賦予之作戰任務相關。2015 年底習近平發動軍改內容中，原本大軍區體制改變為戰區體制，以戰略方向取代防區概念，戰區所屬部隊之演訓任務開始著重在向境外投射作戰力量之聯合作戰型態。近期共軍海軍頻繁在黃海、東海、南海、以及臺灣東部之菲律賓海海域進行遠海長

航訓練及海上聯合演訓，一方面反映出共軍在歷經一個世代之現代化建軍後，海上作戰力量體系已有長足進步，由 052D 型驅逐艦、054A 型護衛艦，以及新一代綜合補給艦所組成之編隊，已是共軍海軍進行遠海長航任務之基本編隊。

2. 對臺認知作戰：遏制臺獨分裂活動

中共向來擅長以政治宣傳包裝軍事活動，達到對敵認知作戰之效果，對臺灣更是如此。三位美國聯邦參議員在 6 月 6 日搭乘美軍 C17 運輸機抵臺訪問後，中共官媒體隨即報導共軍東部戰區第 72、73 集團軍從事跨海兩棲作戰演訓之消息，藉此傳遞中共以對臺施加軍事壓力方式表達對美軍運輸機進入臺灣空域之不滿。

事實上，詳觀中共官媒報導內容可知，其所報導之 72、73 集團軍演訓內容多為對裝備、物資進行登陸艦艇裝卸載、水上駕駛訓練等，屬例行性部隊訓練活動。而共軍從事各項部隊訓練時，該部隊所屬政工部門都會從事相關活動之攝影、影片剪輯製作和新聞發送等。這類部隊演訓的影片並不會在訓練進行期間由演訓部隊逕行發布，而是會由各戰區所屬政治部在適當時機為了對內宣傳或對敵認知作戰需求，交由軍方媒體對外發布。

因此，中共官媒這次發布東部戰區第 72、73 集團軍進行兩棲作戰演訓之訊息，即是因應美軍運輸機載運美國聯邦參議員訪臺，對臺進行的認知作戰操作。因為就軍事層面視之，其所報導之部隊演訓內容並無超出一般性訓練，更未呈現出共軍提升對臺軍事行動動員準備之跡象。可見中共官媒之報導，是典型的「割犬為虎」之對臺認知作戰操作模式。

3. 中美對抗：增強反介入作戰能力

共軍認為未來對臺軍事行動若要獲勝，必須能夠具備對美軍進行反介入作戰之能力，以阻止美國軍事介入臺海衝突。但是北京當局認為美軍在共軍各類遠程打擊火力威脅下，不致直接派兵參與地面作戰，而是會用確保國際航行自由與安全名義，憑藉海空優勢控制宮古海峽及巴士海峽，阻止共軍機艦進入西太平洋對美軍執行反介入作戰，並壓縮共軍對臺軍事行動侷限在臺灣本島西部灘岸，這是國軍反制共軍犯臺之防衛作戰力量最強的場域，這也是美方不斷協助國軍強

化自我防衛作戰能力之主要考量。

因此共軍對臺軍事行動成敗關鍵將會是中美兩軍爭奪宮古海峽與巴士海峽之控制權。共軍若能藉由海空聯合作戰及岸基遠程打擊火力支援下成功奪控此二海峽並將海空兵力投射至西太平洋，展現出對美軍進行反介入作戰之能力，美國在無法順利軍事介入臺海衝突之困境下，應會改採政治協商途徑解決衝突，臺海情勢便會對中共有利。近年來共軍機艦頻繁進出巴士海峽，除執行赴西太平洋遠海長航所必要者外，亦包括奪控巴士海峽及對美軍反介入作戰必要之戰訓任務。

共機在 6 月 15 日多達 28 架次侵擾我防空識別區西南空域，部分共機並穿越巴士海峽飛至臺灣本島東南部外海。共機此舉除了在認知作戰上對臺施壓警告我政府不要「以武謀獨」外，在軍事層面則是演練對美軍執行反介入作戰必要之訓練科目。在共機飛至臺灣東南部之菲律賓海時，當時亦有共軍水面艦遠航編隊自西太平洋返航至該海域，與執行遠程奔襲之共機轟 6K、殲 16 編隊進行相關之訓練。

（三）結語

中共對我軍事威脅日增是不爭的事實。在歷經一個世代的軍事現代化建設，共軍已非昔日吳下阿蒙，共機不再是飛不出領海領空，共艦活動範圍更早已穿越第一島鏈進入西太平洋。中共挾其軍事現代化建設有成所進行之軍事擴張，已嚴重威脅到我國以及整體亞太區域之安全與穩定。

但對中共而言，解決臺灣問題並非單純之軍事問題，而是糾雜著內部政局穩定與政權維繫、中美對抗、民族復興等內外因素。中共領導人向以「大局」觀點作為決策之依托，當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所處之大局是妥善處理中美關係、確保周邊安全環境和平穩定以延續國家發展戰略機遇期，以及追求在本世紀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中國夢。

因此現階段中共對臺軍事威脅是以操作認知作戰，讓臺灣內部對中共可能武力犯臺產生恐懼心理，以此達到「以軍事手段遏制臺獨分裂活動」之目的為主。面對中共與日俱增之對臺軍事威脅以及藉軍事活動所操作之對臺認知作戰，一方面國軍必須要持續強化自我防衛之

不對稱作戰能力，「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另一方面國人亦須明白中共此認知作戰操作模式，方能不為所惑。

五、中國大陸第七次人口普查觀察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員溫芳宜主稿

- 中國大陸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過去十年中國大陸老齡化趨勢正加速進行，但人口總數尚未至下滑階段。此外，受到經濟誘因影響，人口分布朝東部省（市）聚集。
- 中國大陸自 2013 年起陸續放寬生育政策限制，希望改善人口結構、延續「人口紅利」，但目前成效有限；近期人口戰略逐漸重視「人才紅利」的累積，盼透過教育措施提升人口素質。
- 為進一步改善人口結構，中國大陸今年 5 月宣布開放「三孩政策」，政策效果仍待觀察。

（一）前言

中國大陸人口議題長久以來備受關注，特別是 15 歲至 64 歲的勞動人口數量於 2013 年達到高峰並逐漸下滑後，未來應如何規劃人口戰略以因應老齡化趨勢，受到各界重視。中國大陸已於 2020 年 11 月 1 日展開第七次人口普查，希望確實掌握國家的人口總量、結構、地區分布以及遷移流動等人口變化趨勢，普查結果於今（2021）年 5 月 11 日公布。以下將利用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提出對於中國大陸人口議題之觀察與分析。

（二）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特點

根據中國大陸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可發現以下幾項人口特點：

1. 過去 10 年中國大陸老齡化趨勢正在加速進行。將中國大陸第 5 次至第 7 次人口普查結果相比，可知 65 歲以上老齡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在 2000 年、2010 年以及 2020 年分別為 7.0%、8.9% 以及 13.5%。亦即，在 2000 至 2010 年 10 年間，老齡人口比重僅增加 1.9 個百分點，然而在 2010 至 2020 年 10 年間，老齡人口比重卻增加 4.6 個百分點，顯示中國大陸人口老齡化正在加速進行。

2. 中國大陸人口總數目前還未到下降階段。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 年中國大陸總人口數約有 14.12 億人，較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

查數據增加 7,206 萬人，較 2019 年抽樣推算數據增加 1,173 萬人，顯示中國大陸總人口數直到 2020 年仍在微幅增加當中。此外，就人口結構而言，近 10 年來中國大陸 15-64 歲勞動人口比重雖然逐漸下降，由 2010 年 74.5% 下降至 2020 年的 68.5%，但 0-14 歲的幼齡人口占比卻在 2020 年出現增加趨勢，由 2010 年的 16.6% 增加為 2020 年的 17.95%，且較 2019 年抽樣推算數據（16.8%）為高。基本上，中國大陸幼齡人口比重在 2010 年至 2019 年間從未達到 17%，因此，中國大陸官方自 2013 年起即逐步放寬人口生育限制，希望提高民眾生育率。若未來幼齡人口比重能夠持續緩步增加，則對於中國大陸延緩老齡化趨勢將有所助益。

3. 中國大陸人口分布朝東部省市聚集。本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大陸東部、中部、西部以及東北地區人口比重，分別為 39.93%、25.83%、27.12% 以及 6.98%，其中，東部地區人口比重較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增加 2.15 個百分點。此外，與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人口成長最多前四大省份依序為廣東、浙江、江蘇及山東，皆為東部地區省份。

綜觀普查數據結果可發現，東部省份人口成長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經濟發展誘因吸引勞動人口移動所致，而非人口生育成果促成。與全國平均數值相比，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較快的東部省市，其幼齡人口比重相對較低。以全國平均幼齡人口占比 17.95% 作為比較基準，中國大陸兩大直轄市-北京、上海的幼齡人口占比分別為 11.84% 及 9.80%，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數值許多。此外，近 10 年人口數量成長最多的四大省份當中，除山東（18.78%）及廣東（18.85%）的幼齡人口占比達到全國平均數值之外，浙江（13.45%）及江蘇（15.21%）的幼齡人口占比皆低於中國大陸全國平均水準。

4. 過去 10 年間中國大陸平均教育程度提高；北京、上海、天津之人口教育素質明顯高於其他區域。本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大陸近 10 年來人民教育程度明顯提高。其中，每 10 萬人中擁有大學教育程度者，由 2010 年的 8,930 人增加至 2020 年的 15,467 人；此外，15 歲以上人口之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08 年提高至 9.91 年。

將區域之間的教育程度相比，則北京、上海、天津之人口教育素

質明顯高於其他區域。以每 10 萬人中擁有大學教育程度之人口數量來看，北京、上海及天津分別達到 41,980 人、33,872 人以及 26,940 人；此外，上述三省市 15 歲以上人口之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達到 12.64 年、11.81 年以及 11.29 年。值得注意的是，山西、內蒙古、遼寧等省分，雖然並非東部經濟發展快速地區，然而其人民平均教育素質並不遜於江蘇或廣東等經濟發展省份。以遼寧為例，每 10 萬人中有 18,216 人具有大學教育程度，15 歲以上人口之平均受教育年限為 10.34 年。至於江蘇每 10 萬人中具有大學教育程度者則為 18,663 人；15 歲以上人口之平均受教育年限為 10.21 年。

5. 中國大陸城鎮居住人口及全國流動人口較 2010 年大幅增加。流動人口是中國大陸長期以來人口議題的重點之一，然而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報當中，關於此一議題的數據揭露並不多。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報內容，中國大陸 2020 年居住於城鎮的人口將近 9.02 億人，占全國人口 63.89%，較 2010 年增加 2.36 億人，比重增加 14.21 個百分點。此外，2020 年中國大陸人戶分離人口約 4.93 億人，其中，流動人口¹約 3.76 億人，較 2010 年流動人口成長 69.73%。

（三）中國大陸人口戰略將由人口數量與人口素質並行

大量的勞動供給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所仰賴的動力之一，因此，中國大陸「人口紅利」能否維持，一直是國家層級關心的戰略議題。有鑑於中國大陸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 2010 年達到 74.5% 的高峰，² 而後逐漸下降，因此，中國大陸近年來針對人口生育限制逐漸鬆綁，希望持續人口優勢帶來的經濟紅利。

首先是 2013 年提出「單獨二孩」政策，放寬夫妻兩人若有一方為獨生子女，則可生育兩個孩子；而後於 2015 年底通過「二孩政策」，允許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二孩政策」的實施使得中國大陸人口出生率在 2016 年及 2017 年有所提升，惟此一政策目前看來僅有短期效果，2019 年中國大陸人口出生率仍下滑至 10.48%，為歷史新低。

¹ 根據中國大陸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報，「人戶分離人口」是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流動人口」是指人戶分離人口中，扣除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

² 中國大陸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 2010 年達到高峰，至於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則是在 2013 年達到高峰。

為進一步促進生育意願，中國大陸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公布後，隨即於今年 5 月 31 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宣布將進一步放寬生育限制，允許一對夫妻可生育三個子女。

上述政策基本上是由「人口數量」的角度著手，試圖以放寬生育限制、提升生育率的方式，改善中國大陸人口結構、延緩人口老齡化進程。然而，中國大陸近期對於人口議題的焦點，逐漸將「人才紅利（素質紅利）」的重要性提高，而不再是僅由「人口紅利（數量紅利）」的觀點切入人口議題。

在此情況之下，今年 3 月公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綱要」），以「建設高品質教育體系」作為專章，說明如何透過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加強職業技術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品質，以及建設高素質專業化教師團隊等政策措施，希望達到提升國民素質之目標。此外，「十四五規劃綱要」當中，將「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於 2025 年提高至 11.3 年」作為約束性指標，也突顯中國大陸未來對國民教育將更為重視，以作為累積「人才紅利」之基礎。

（四）結語

為改善人口結構，延緩國家人口老齡化趨勢，中國大陸已自 2013 年起陸續放寬生育政策限制，惟就目前執行成果而言僅有短期政策效果。中國大陸針對生育政策檢討後發現，生育成本負擔以及現代人生育觀念的轉變，是影響民眾生育決策的關鍵因素，也是生育政策成效不彰的癥結點。然而，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公布後，中國大陸在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下，仍決定以「三孩政策」作為促進生育的措施。關於「三孩政策」能否有效且長期提升中國大陸人口出生率數值，仍需後續觀察。

此外，中國大陸近期對於人口議題之關注，已逐漸意識到「人才紅利」的重要性。就此議題而言，教育資源的有效運用及分配，將是人力素質培養之關鍵。有鑑於中國大陸流動人口眾多，且多半受到經濟誘因驅動，由經濟發展較慢的地區向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流動，因

此，未來如何充實經濟落後地區的教育資源，將是中國大陸勞動人口教育素質進一步提升之關鍵。

六、中共對臺灣疫情之言論及作為觀察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瑟致主稿

- 臺灣疫情擴大給予中共操作「疫情統戰」機會，讓臺灣面臨「政治疫情」與「病毒疫情」雙重壓力，中共企圖營造我民眾對政府之不信任感。
- 中共藉捐贈陸製疫苗、阻撓國際援臺，迫使臺灣接受來自中方的幫助，形塑中共制度治理優勢。

臺灣疫情自5月開始進入本土確診人數急速擴大的狀態，防疫等級也提升到第三級，這是自去年疫情開始在全球蔓延之後，歷經將近一年後臺灣再度陷入疫情之困。面對疫情再起之勢，國內社會瀰漫著深怕感染病毒的氛圍，而除了確實做好防疫各種環節之外，「篩檢」、「隔離」及「疫苗」成為輿論聚焦的關鍵字，各界也紛紛出現各種意見與訊息，當然來自中國的政治耳語也沒有缺席。

對中共而言，很長時間臺灣防疫成績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如今失去防疫優等生的光環，正好成了對岸操弄政治風向的時機，讓臺灣面臨「政治疫情」與「病毒疫情」的雙重威脅，「疫情統戰」成了中共對臺政策的突破口，必須謹慎處之。

（一）中共的疫苗外交及對臺疫情統戰

事實上，中國早已對外展開「疫苗外交」，許多弱勢國家無法順利採購疫苗，就成了其輸出「中國製疫苗」的對象，這不但可以讓「中國製疫苗」得以藉此進行類似「臨床試驗」的測試，同時也讓中共有了粉飾「國家形象」的機會（北京新浪網，2021年1月4日），當然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歐美國家開始正視中國疫苗外交的政治動機，以及擔憂低效能的中國製疫苗會否造成全球疫情再次肆虐的可能性。

當然，部分國家在開放民眾施打中國製疫苗後，確實也造成疫情陷入更緊張的局面，有些國家紛紛作出終止施打、更替疫苗的決定（聯合新聞網，2021年5月1日），對照近期先進國家開始對外進行「疫苗外交」

相比，中共疫苗輸出的邊際效益正逐步下降，負面效果被放大檢視。

中共對臺疫情的態度更可以從中國式「疫苗外交」來觀察，主要可以分成兩個階段，首先在臺灣疫情還受控得宜之時，當時便傳出中國有意透過贈送疫苗來影響我邦交國的政治選擇，「疫苗」成了中共對臺進行「外交攻防」的工具（自由時報，2021年5月28日），縱然這對深受疫情侵擾的國家而言極具吸引力，但在我外交部及國際友好國家的相助之下，得以抗衡來自中國疫苗領銜的外交戰。

其次，近期臺灣進入疫情緊張之際，中國的疫苗外交轉向對臺進行「疫情統戰」，一方面也使出「提供疫苗」的手段（中央社，2021年5月26日），試圖建立中國「親」臺的形象，另一方面持續阻撓臺灣獲得國際援助，甚至企圖壓制臺灣在全球公衛的能見度，無論如何都對民進黨政府戴上「以疫謀獨」的帽子。

（二）中共意圖塑造形象、治理能力大內宣

可以特別留意的是，當臺灣社會出現「疫苗之荒」的現象時，中國加大對臺輸出疫苗的力道，不但表示可以提供中國製疫苗，也大方宣稱可以讓臺灣自行選擇任何品牌的疫苗，同時藉由臺灣親中人士打著「中國民間捐贈疫苗」的名義，不顧臺灣現行法規的限制，故意泛泛起輿論討論來逼迫民進黨政府表態，其用意就是要將臺灣拒絕中國疫苗貼上「政治考量」，而不是顧慮「民眾健康福祉」。

不僅如此，當日本與美國相繼對臺捐贈消息一出，中共的馬腳立刻露出，不但以「干涉內政」為由批評美日兩國（蘋果新聞網，2021年6月1日），更有意抬高「中國製疫苗」與其他品牌疫苗的競爭力，聲稱品質並不比其他國家的疫苗差（中央社，2021年6月4日），顯見中共對臺疫情的思維仍存有政治鬥爭的慣性。

除「疫苗」議題的操作之外，中共更有意釋出兩岸共商防疫的訊息，透過線上會議及官媒報導等途徑（中時新聞網，2021年6月1日），以及不斷對外宣傳臺灣民眾在中國順利施打疫苗的消息（聯合新聞網，2021年6月15日），就是要建構中國在防疫事務上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對比歐美國家過去一年深受疫情肆虐的狀況，中國採取封鎖式的防疫作為成了對外進行「制度之爭」的利器。

當臺灣社會大眾開始對政府防疫有所批評時，那麼正可以藉此對臺進行「典範轉移」的作用，尤其在五月中旬臺灣本土案例有不斷攀高的跡象，「全國普篩」與「方艙醫院」等成了部分輿論焦點，甚至出現移植中國防疫經驗的論點，而國臺辦也不時表示願意提供防疫上的協助，對中共而言，臺灣社會出現對政府防疫工作的疑慮，將有利於中共形塑兩岸制度比較的氛圍，對內也可以作為「大內宣」的一環，拉高政權的社會認同。

（三）小結與建議

問題在於，國內民眾多數對中國製疫苗沒有信心，中共也應當很清楚輸出疫苗到臺灣的困難度，以及不見得臺灣社會會埋單，因此，中共對臺策略重點並不是要讓臺灣接受中國製疫苗，而是要營造臺灣民眾對政府防疫的不信任感，以及阻撓臺灣向國際藥廠直接採購。

中共目的是讓臺灣陷入疫苗之荒中，並引起社會大眾的不滿，逼迫政府不得不向中國求援，以北京的名義向國際社會採購再捐贈給臺灣，達到「矮化臺灣」及「中國協助」雙重效果，這也符合中共過去對臺「軟硬兼施」的特性，而較過去不同之處，針對臺灣疫情的議題操作，臺灣部分輿論讓中共的意圖更為得心應手，「政治疫情」與「病毒疫情」同時出現，足讓民進黨政府更疲於奔命，同時希冀臺灣中央地方不同調而衍生出防疫的矛盾與破口（新頭殼，2021年5月24日）。

展望未來，臺灣必須持續關注全球疫情的變化趨勢，縱然諸多歐美國家的疫苗施打覆蓋率已大幅增加，疫情也有逐漸減緩的跡象，不過，病毒變種及傳播的不確定性，將可能讓全球再出現新一波的公衛浩劫；換句話說，如果疫情沒有完全終結，那麼除了疫情之外，臺灣深受來自中共的「疫情攻勢」將會持續下去，因此，不能因為首波疫苗儲備壓力緩解後就放鬆各種防疫環節，否則中共絕對會見縫插針，更不用說還得面對國內複雜的政治因素。

基於此，經過這段期間，來自中共密集的疫情攻勢，以及國內部分有心人士的推波助瀾，政府相關部門應當特別留心，任何防疫環節都可能成為被政治操作、攻擊的素材，除了要即時澄清之外，也必須將任何來自中共的「疫情統戰」行為公諸於世，讓國人有充足認識與準備來因應這場看不到休止號的疫情認知作戰。